

(民主德国) 博多·乌泽 著

田达生 徐士龙 译



爱国者



Bodo Uhse
Die Patrioten

据 Aufbau-Verlag Berlin
1954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杨 勤
封面设计 赞 兴
技术设计 黎 东

【民主德国】博多·乌泽著 田达生 徐士龙译

爱 国 者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8.25 插页5 字数362千
1988年11月第一版 1988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7-5366-0726-1/I·141

定价：5.05元

内容简介

本书描写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下一批爱国青年从苏联返回国土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斗争。他们致力于恢复被破坏的地下党组织，营救被监禁的共产党员，教育人民憎恨和反抗法西斯统治，以他们的英勇行为促进了德意志第三帝国的覆灭和民主共和国的**新生**。小说主人公机智勇敢，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同时也经历了战胜软弱和恐惧的心理矛盾和在家庭、爱情上表现的温情，因此使他们显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小说主要采用传统叙述的手法，同时以多角度多层次的情节穿插，使故事场面显得宽广和富有立体感；在自然描写和人物心理描写上也格外细腻，从而在创作手法上显示了作者的**艺术才能**。

译者前言

1945年5月7日，希特勒统治了12年的德意志第三帝国的代表在无条件的投降书上签字，时过4年——1949年10月7日——在一片废墟上诞生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3月革命未实现的理想，德国无产者1918年未竟之业，终于开始成为现实。

为了解这种必由之路，应回顾历史，回顾“第三帝国”的历史，在这方面出版界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历史著作，而以文学手段大规模描写二次大战中德国本土反抗斗争的作品似不多见。

民主德国著名作家博多·乌泽的代表作《爱国者》便是反映成为二次大战转折点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后，流亡苏联的德国爱国者秘密空降，返回祖国，与地下反抗战士及各阶层爱国民众结合，在希特勒后院开展反法西斯斗争的长篇。

古往今来，“爱国”成了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它使昏昏欲睡者猛醒，令自甘落伍者奋进，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激发我们高尚的感情。因为爱国者们所爱的首先不是自我，而是他人，是民族，是祖国，是世界！

战前德国共产党人就警告说：谁选举希特勒，就是选举战争！战事既起，德共党人又成了反战的中流砥柱。乌泽指出，真正的爱国者是他们。反法西斯战士，站在斗争前列的又是德共党员。他们为了美好的德国，不畏险阻，奋斗不已。

“爱国者”所采用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作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书中英雄真实可信，有一定典型意义。语言于朴实中见优美。

本书翻译过程中曾得到北京大学赵登荣副教授的大力协助，谨此致谢。

译者虽不畏繁难，孜孜以求，但因寡闻孤陋，译文中不妥欠佳之处，恳请读者诸君指出。

译者

1987年元月

“你了不起，玛丽亚！简直了不起！”

年轻人嚷着，白生生的脸上喜气洋洋的，瞅着并排坐在做工粗糙的长凳上的妇女。俩人一式穿着，都是灰飞行服，但他刚才克服了一次险情，兴高采烈得摘了头盔。寒风吹过宽阔的机场，扯动着他长长的黑发，刺骨地冷。三月的天空粉蓝粉蓝的，总也不肯预示出浓烈的色彩；太阳尽管放射着光华，却仍然无力。他俩背靠砖墙，里面沁出一股冰冷的寒气。远处，森林与机场毗邻的地方铺着积雪。然而，空气里已饱含泥土的芳香和万物滋生的春天气息。

“怎么样，萨维尔耶夫同志，”年轻人兴致勃勃，用俄语问飞行员，“她干得真漂亮，对吧？”

这个敦实的军官，至多25岁，他含笑一仰头，布满雀斑的鼻根形成了愉悦的细纹。

“Хорошо①，Хорошо！”他大声道，迟疑着坐到长凳上，与他俩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他们不久前才从他的飞机

①俄语“好”。

上跳伞下来，他不认识他们，对他们的身分感到奇怪。

“你听见啦，玛丽亚！”年轻人的声音得意而且响亮。

“他也这么说，他懂行，他的话信得过。”

她的脸紧紧包在头盔里，轮廓分明，表情略显严肃。可长而密的睫毛间那双金褐色的眼里透出的目光，却充满了善良和温润；便是现在，当她试图用嘲讽的微笑抵御这个比自己年轻的人赤裸裸地表示的溢美时也是如此。他并不回避她的目光。

“我知道该说什么，玛丽亚，”他以年轻人的断然口气说，“你本来就是好样的，谁也否认不了，玛丽亚。”

该不该回避这一片衷心的信赖呢？她颌首注视搁在膝间细长的双手，额上起了沉思的皱纹；她感觉到了小伙子式的，温柔的钦慕，她担忧了。

“你对我怎么看，赫尔穆特——，”她开口道，感到嘴边有股寒气。她不说完，摇摇头轻声笑着，笑声中掩藏着窘迫，还有某种感动。不，不能看得太认真，来个警告也许会叫赫尔穆特——在她眼里，他不几乎还是个孩子么？——心里明白。

“看那儿！”身旁的飞行员用仍旧套着沉甸甸皮手套的左手，指着机场上空的飞机说。恰好有个人影脱离了飞机。少顷，淡黄色的伞衣形成的圆筒如骤然腾起的火舌，在黑糊糊的人影上方悬挂了片刻，数秒钟后，便张开成钟罩似的圆形。伞下的人在风里急剧摆动，无论手臂和腿怎样做划行动作，看来都无法缓和这剧烈的摆动。降落伞打着旋儿，一忽

儿朝这儿一忽儿朝那儿，有一次，那样子像风要将它掀翻似的。

年轻人用肘碰那位妇女，她同样是跳伞下来的，坐在她一侧的飞行员直摇脑袋。”

“看看，这到底怎么收拾？”年轻人咬着牙咕哝，紧紧盯住迅速下落的伞。而玛丽亚眼见那人结结实实摔到地上时，全身猛地一颤。伞被阵风驱赶着，拖着那人在地上跑。

“他也真够笨手笨脚的！”年轻人嚷嚷着，气呼呼地把拳往空中一挥。“他怎么不收腿啊？”

“大概……哦，准是受伤了。”玛丽亚说。

“那就是他的错了！”赫尔穆特没有同情。

远处的几名士兵，穿过机场，向降落伞跑去，迫使伞收下。

“那是谁呀？瓦尔特·凯勒曼？”玛丽亚问。机场另一头的士兵正招呼跳伞下来的人，替他解开背带，扶他站直。两个兵把他夹在当中，带着他跑了一段，将他放回到地上。划着臂示意他如何动作。

“还是我对吧？”玛丽亚说，又抢进几步，踮起脚，想看看个明白。“他哪儿摔坏了？”

赫尔穆特跟了上去。

“不是彼得·维特坎普，”他说，“要他绝不会出这种事。”

萨维尔耶夫用焦急的声音，朝一辆载重汽车的司机喊了几句，这一位就在附近，正倚在汽车散热器上，一根燃得差

不多的烟头在嘴里打转转。他开了发动机，驶过机场上蓬乱的草地，接伤员去了。

“我跟你讲，”赫尔穆特左手抓住玛丽亚的胳膊重复道，“是他自己的错。”显然，他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

玛丽亚感到诧异，她瞅着这个年轻人匀称的，忽然变得一本正经的脸。他忽地酷似他父亲了。玛丽亚跟他父亲很熟，许多年前，她就像他对她这样，怀着同样的钦慕和狂热对他父亲表示过景仰。

“怎么这么说！”她说，这种责备纵使严肃，听起来还是亲切、温存。

小伙子一伸脖子。“我的嘴没遮拦，”他说得很快，像连珠炮，接着是一阵短促而自信的笑声。“瓦尔特就是害怕。”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她对他这么快就下判断很气恼，想提个问题考考他。

“好，听着！不然就不会这副模样了，玛丽亚。”他说着把头凑到她的头跟前。

“噢，该我跳的时候也不那么舒服。”玛丽亚说，依旧在生气；又问：“那你呢，你当时就不怕啦？”

“我？没怕！肯定没怕！”他毫不犹豫地答道，声音清晰、响亮，听不出有什么闪烁其词的地方，也没有因装腔作势使这对生活充满信心的坚定语调黯然失色。

你是多可爱的小伙子，多么有生命价值的人啊，玛丽亚想，气恼顿消。

他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她想，他还属于未来。当人成其为人的时候，就会是这样。赫尔穆特·维格勒，1925年生于柏林，后流亡苏联，在年轻的巨人莫斯科的中学和大学里受到教育和培养。1943年这个战争年代三月的一天，在莫斯科郊外的机场上，年轻的赫尔穆特·维格勒的形象，在她心中唤起了对一代新人的幻象；他们坚强有力，无所忧虑，无所畏惧。

这当儿，矮胖而快活的飞行员来到他们身边，探着脑袋，嘴唇微启，仔细听着他们的外国话硬梆梆的发音，边听边无所顾忌地打量这两个人。

现在，他叫他们注意返回的汽车，但只冲赫尔穆特说。

“他来了，你们的伙伴！”

又突然问道：

“你们到底是哪国人——德国人？”

玛丽亚只是点点头。脸上有雀斑的飞行员一句话没说，正打算转身走开，却又踌躇着站住了。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奇特的经历。他至今尚未面对面地见过德国人，仅只是听说过他们，而他听到的又没一句好话。这个年轻的拖拉机手为了当飞行员，于战争爆发之际离别了故乡的村子。不久前红军解放了他的家乡。

红军给了他假，让他回去看看。回乡时那一片触目伤怀的景象怎能叫他淡忘。当时眼前所剩无几，一座由灰烬、破烂和垃圾堆成的秃山占据了那块空地；原来那儿有幢房子，在那暖人的薄暮时分，母亲的眼睛曾如星星般闪亮。离这儿

不远，拖拉机站——他初次参加工作的地方——被硝烟熏黑的断垣残壁在悲叹。就在这里，生活的体验、最初的自信、大胆的希望以及年轻人的进取心使他的头脑日渐成熟。

然而，他所爱的人，天真的弟弟彼得，美丽而忧郁的姐姐，还有妈妈——她早添愁云的脸上长着星星般的眼睛，他们全都杳无音讯。在村前小湖边的一株仿佛被闪电劈碎的橡树下，谢苗·萨维尔耶夫和着滴滴泪水，将仇恨咽进肚子里。

“你呢，”他问赫尔穆特，“你也是一起的？”

“当然，萨维尔耶夫同志。”赫尔穆特应声而答，他口气很轻，但十分恳切，语气谦虚，落落大方。“我也是德国人，正如自己希望的，是个善良的德国人，一名共产党员。”

飞行员皱着脸孔，听完了赫尔穆特的话，神色近乎阴沉。看来他很失望。远处森林的上空，飞机正在下降，准备着陆。

“怎么啦？再没人跳了？”赫尔穆特问飞行员。

“再跳没意义。风太大。”萨维尔耶夫说，他心情忧伤，耸起圆乎乎的宽肩膀走开了。

玛丽亚感谢赫尔穆特这么自然而然就找到了答话。她只能保持沉默，她被深深的羞愧压抑着。每当她想起自己的祖国，每当什么事促使她想起这点——这个时候，在这个国家，有人提起说自己是个德国人，羞愧便向她袭来。赫尔穆特却不一样。他多么自然就找到了恰当的答话，称自己为一名善良的德国人，一名爱国者。即便在危险的时刻拥护自己的事业，都不像在羞愧和屈辱时站在它一边那么困难。正是

在这一点上玛丽亚感觉到，赫尔穆特仍然以他简单的自白表明自己在时代的洪流中激流勇进，他属于未来，胜利不会从他手中丢掉。

但她却说：

“果不然。风太大，不能再跳了。你得请瓦尔特·凯勒曼多多原谅。不像话，不像话，你胡扯了他些什么！”

他似乎感到惊异，不安地转动着手里的头盔，两脚交替地踏着，又冷不防朝卡车跑去，边扭过头冲她喊道：

“抱歉，玛丽亚，真的，我抱歉。”

他不叫我的名字连话也说不出来。她大步跟在他身后时心里想。

瓦尔特·凯勒曼合着眼。他躺在车上，微长的脸苍白。他松开了咬得紧绷绷的牙，发出了一声叹息。

结果也会这样。赫尔穆特·维格勒想，对此感到愕然，他自己从斜着身子盘旋的飞机上头朝下降落时，压根儿没产生会出事的念头。

有人剪开伤员的靴子。他两腿套着厚羊毛袜，紧靠踝骨的上方肿起来了，尤其是右腿已肿得不成形了。

“滑雪也许我算是完了。”瓦尔特·凯勒曼抱怨道。

他们替他盖上羊毛毯，让他躺在车上等救护车。

一架大肚子灰色客机开过来了，排气管喷出最后一道火舌，螺旋桨慢慢旋转着，发出啸声，再次划破空气，然后猛地停住不动，似乎从未转过似的。制动器抓紧，止住了轮子的转动。

赫尔穆特迅即跑过去，想跟彼得·维特坎普说话。听机组的人说，机上只有一个人时，他失望了。本来肯定是两个人跳，可是只有一个人上了飞机。

“玛丽亚，”赫尔穆特叫道，“玛丽亚，彼得·维特坎普根本没在上边！”

“我只想看看你在不在家。”彼得·维特坎普嘴角挂着亲切的微笑，走进玛丽亚的房间，说道。他们都住在这个莫斯科饭店里，他有时候就这样，从上一层自己的房间里下来找她。面对窗户上的光，他边眨动着起了皱纹的苍白眼皮，边不慌不忙谨慎地打量着玛丽亚。他就这样站在门口慢慢拉上身后的门。

玛丽亚对他的到来已习以为常，看不出这一回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因为冷，她腿上裹了条羊毛毯，坐在沙发里无法动弹，手里拿了本刚刚看过的杂志，朝彼得·维特坎普扬了扬，柠檬黄的封皮犹如一只南部的大蝴蝶扑扇着翅膀。

“不，这你得看看！”她高声道，她非常熟悉彼得·维特坎普那张布满粗勒皱纹的脸，但由于一心想着方才读过的内容，竟未觉察出那张脸上不慌不忙的审度的神情。“真的，你该看看。”

椭圆形桌面上铺了张紫红色天鹅绒老式台布，此时，黄蝴蝶落下，张着翅膀停在台布上。

彼得·维特坎普打玛丽亚身边走过，朝窗边走去；他用厚实的、布满小黑斑的手碰碰她的肩，表示匆匆的问候。

一种特殊的兄妹情谊把他俩，威斯特法伦的矿工和汉堡码头工人的女儿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无声的友谊，不容表白，不求温情，它并无干预对方生活之意，而是在相互尊重，彼此信赖之中追寻自己的目标。

“好啊，你什么也不说，”玛丽亚不无责备地嗔怪道。“你不喜欢。可对于我”——她迟疑了一下，也不看彼得·维特坎普一眼，只是悄声往下说——，“对于我，你知道，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意义太重大了。”她的手摩挲着桌上的杂志，动作轻柔，甚至饱含深情。

她说着，一面设法将裹在毛毯里的腿解脱出来。

“有时我有这种感觉，”她又活跃起来，说道，“生活当中，有许多重要的事，对我们已是理所当然的了，根本没留意。可在这儿——在这件小事上，要是你也这么看——，在这件事上，我又感觉到了。”她用毯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怎么也捋不下去，加上一双脚心急火燎地乱踢蹬，弄得益发狼狈不堪。

“苏联人怎么搞出来的？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一心一意去打仗，怎么还能同时搞这个？——一本德文杂志，诗、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不，你应该看这个！”

现在，她已无计可施了，只得弯下腰将毛毯松开。

“别笑话我！”她躬着身子抬眼看，察觉到他脸上肆意讥诮的笑，感到又害臊又可笑，便责怪道。她终于从毯子里爬出来了，让它在地板上堆作一团。

“没有的事，玛丽亚！我可一点没笑！”彼得·维特坎

普辩解道。“你在地上瞎折腾，看着可真有点滑稽。”

这下他确实笑了，是低沉、有力、无拘束的笑；随后，又从窗边走到这间狭长的屋子中间，他几乎掩饰不住内心的不踏实，小心翼翼问道：

“说说看，近来怎么样？开了个玩笑？”

“对，你一下子藏到哪儿去啦？”玛丽亚嚷道。“赫尔穆特什么也没跟你说？——瓦尔特·凯勒曼这会儿怎么样？”

“他们七手八脚就把我接走了，太蠢！”彼得·维特坎普骂起人来就这么一句，其目的似乎总在于少说话多闭嘴。玛丽亚不无担心地看着他在书桌前一张精巧得叫人觉着一坐就会散架的沙发椅上坐下，一条腿架在扶手上。

“劳驾你念念这首诗！”玛丽亚出人意料地请求说，从桌上拿起那本杂志，但开始念之前又说道：

“我没忘了究竟为什么到这儿来。格奥尔格·维格勒在我房间里。他也想跟你谈谈，说不定马上就下楼来。”

她仍旧未听出来彼得·维特坎普暗暗提醒的语调。

“你为什么这会儿才讲！本来一来就可以说！”她大声道，连忙往锅里加水，把锅放在电炉上。

“他说什么也得喝点茶。”

过了一会儿，他才还她杂志，又默不作声地朝她点点头，但嘴唇动了；刹那间，她觉得他是在默默复述那首诗的最后几行。

奇怪的是，她不加过渡，大声说时，听来犹如回声：

“等待太难了，这个时候等待。我报纸从头读到尾。几

乎不关收音机，成天忙于观察动静。我觉着目光一秒也不能离开，就这么样忙个不停——说实在，什么也没干。这不行，我不能再等了！”

格奥尔格·维格勒迈着急促的步子，噤噤噤走进来，径直走到玛丽亚身边，抓住了她的两只手，细长的吊梢眼透过椭圆形眼镜，直视着她的脸。

“你气色很好。”他说话时的声音和态度都像一位医治好病人，正在复查的大夫；他满意地点了点蓄着尖胡子的下巴，下了断语，又故意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把搭在胳膊上的那件厚厚的羔皮大衣撂到屋角椅子上，不让人看出自己此时有身负重任之感。他胡子半遮的嘴带着微笑，走到玛丽亚身边，在彼得·维特坎普对面的矮沙发上坐下。

“伊丽莎白怎么样了？”玛丽亚问。

格奥尔格撑起肩，好似承受了沉重的压力。

“没变化……病情……涅米索夫大夫尽了最大努力，真叫人感动。”

房间里暗了下来。一束微弱的灰光透过高而窄的双层窗射进来，里面明显地感到冷，他们三人将手拢住盛着古铜色茶水的玻璃杯取暖。

玛丽亚跟这两个男人坐在这间富于封建时代那种古色古香情调的小房间里，她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比较着。

她从彼得·维特坎普严峻而善良的宽脸盘看过去，看到格奥尔格·维格勒，他正把冒着热气的杯子送到嘴唇边。

我值得他们的信任么？她思忖道。肯定的回答与提问差不多同时响起，当她气恼地赶忙屏弃这个回答时，满头剪短了红头发的脑袋垂了下来。这不行，她双眉深锁思虑道，又认为，对此作出肯定答复，务必要有进一步的依据，不可仅凭有限的自信。人必须反复考验自己，这种自我考验每次都得彻底重来。

格奥尔格·维格勒与彼得·维特坎普进行了简短的谈话，然后转身向着玛丽亚，他的话将她从沉思中惊醒。

“我到这儿来是想再跟你谈一次，”他说得徐缓而且清楚，这是为掩盖图林根方言养成的习惯。“我们跟每个人都得单独谈一次。这一步确实不容易，务必仔细考虑。”

他把话打住，玛丽亚重又垂下了眼睑，她感到这两个男人并没看自己，而是将目光从自己身边移开，仿佛想要玛丽亚忘记他们在场。

“很困难的一步。你要冒生命危险。但这也许根本算不上最严重的，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格奥尔格说得很慢，一只手捻弄着夹杂少许银丝的胡须，像在斟酌每一个词。“人人都得再次考验自己，再决定是否承担这项任务。”

他深深吸了口气，听来欲叹又止，但玛丽亚抬起头时，他用右手做了个断然拒绝的动作，食指与无名指之间夹着根带硬纸长烟嘴的香烟。

“不不，我们现在不要你回答，”他接下去说，声音大了，语气带几分严厉。“会给你时间让你好好考虑，你应该自己作出决定，对吧？”